

梁银峰
著

汉语史指示词的

功能和语法化

上海教育出版社



汉语史指示词的 功能和语法化

梁银峰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史指示词的功能和语法化 / 梁银峰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444-8251-6

I. ①汉… II. ①梁… III. ①汉语—词语—研究
IV. ①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8078号



责任编辑 徐川山

封面设计 郑 艺

汉语史指示词的功能和语法化

梁银峰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16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251-6/H·0276

定 价 7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1.1	指示词的界定与分类	1
1.2	选题意义	7
1.3	本专题研究现状回顾	8
1.4	本专题研究现状述评	20
1.5	本书的研究内容、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22
第二章	上古汉语指示词的语义功能：基于语体的视角	28
2.1	引言：语体的现场性制约与指示词的使用	28
2.2	上古汉语的指示词在语义上的综合性特征	30
2.3	上古汉语的指示词在不同语体中的指示性	34
2.4	本章小结	47
第三章	上古汉语指示词“之”的语义属性	48
3.1	前人研究回顾	48
3.2	上古汉语指示词“之”的照应功能	52
3.3	上古汉语指示词“之”的预指功能	63
3.4	本章小结与余论	64
第四章	上古汉语指示词“其”的语义属性	68
4.1	指示词“厥”和“其”可能同源	68
4.2	指示词“其”表远指(远称)、兼指或中指的說法不可靠	70
4.3	指示词“其”表认同指	72
4.4	“之”的回指功能可否也看作认同指？	75
4.5	东汉以后“其+NP”格式中“其”的语义功能(“NP”包括“N”)	76
4.6	本章小结	81

第五章	上古汉语指示词“是”的语义属性	83
5.1	上古汉语的“是”是近指词或中指词吗?	83
5.2	现代汉语“这”的中性指示用法	84
5.3	上古汉语指示词“是”的语义功能	85
5.4	上古汉语指示词“是”“此”在语义功能上的差异	89
5.5	本章小结	93
第六章	“箇(個、个)”的语义属性及其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流变	95
6.1	指示词“箇”的语义属性、句法功能和方言基础	95
6.2	指示词“箇”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流变	102
6.3	现代汉语方言中名词性指示词的“一分”现象	107
6.4	中古近代汉语指示词“箇”的来源	109
6.5	本章小结	114
第七章	“阿的”“兀底(的)”的方言背景、语义属性及其流变	117
7.1	“阿的”的方言背景及其来源	117
7.2	“兀底(的)”的方言背景	122
7.3	“兀底(的)”的语义属性	124
7.4	“兀底(的)”的来源	139
7.5	山西晋语、陕西关中方言的指示词是否全为三分系统?	143
7.6	本章小结	147
第八章	上古汉语旁指词“他”的语法化	148
8.1	定冠词“他”的产生及其流变	148
8.2	第三人称代词“他”的形成机制	169
8.3	构词成分“他”的产生及其流变	184
8.4	本章小结	203
第九章	上古汉语指示词“是”的语法化	205
9.1	系词“是”的产生年代和形成途径研究述评	205
9.2	系词“是”的形成机制	222

9.3	焦点标记“是”的形成过程	235
9.4	本章小结	246
第十章	上古汉语指示词“夫”的语法化	
	——标补词“夫”的形成过程	247
10.1	关于“标补词”	247
10.2	上古汉语中引导小句的“夫”	249
10.3	标补词“夫”的来源及产生途径	257
10.4	本章小结	265
第十一章	结束语	267
11.1	本书的基本观点	267
11.2	本书的创新之处	270
11.3	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275
参考文献		277
后记		292

第一章 引 论

1.1 指示词的界定与分类

1.1.1 指示词的界定

按汉语学界的习惯,一般把指示词称作“指示代词”,这是因为汉语中的指示词一般都有代替的功能(同时兼有指示性),但如果从跨方言或者跨语言的角度看,现代汉语不少方言中以及世界上不少语言中的指示词并没有代替的功能。如广州话的“呢(这)”“嗰(那)”和苏州话的“埃(这)”“喂(那)”“噺(这/那)”等许多粤、吴方言的指示词从不单用,而要和量词组合以后才能单用或再加在名词之前(参见刘丹青,2017: 120)。另外,汉语的某些指示词(如上古汉语的“其”和现代汉语的“该”)也没有代替的功能,都不能归入代词;而且就指示词本身来说,虽然它有指示和代替两种功能,但指示是第一位的,这是这类词区别于其他词类的重要语义特征,至于代替,并不是这类词所独有的功能;^①另外,汉语中不少指示词还有虚化用法,这些虚化用法仅有指示功能,没有代替功能,所以如果仅用“指示代词”是无法涵盖这些功能的。基于上述考虑,本书采用“指示词”这一叫法。

与其他词类相比,指示词(indexicals 或 deixis)的语义无法从自身获得,而需要从它们所指称的其他的人或事物获得,其特点是随语境(言语场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指称对象,其所指与话语参与者(说话

① 杨伯峻、何乐士(2001: 145)在谈到古汉语指示词的作用时说:“指示代词兼有指示和称代两种作用,称代是它作为代词的共同属性,指示是它作为指示代词的特殊属性。”这一表述容易使读者觉得指示词的称代作用是首要的,指示作用是次要的。

人和听话人)、言谈时间和言谈空间密不可分。基于这一角度,国外有些哲学家或语言学家把人称代词、某些处所词、某些时间词或时间副词、方位词、某些社会称谓语和某些趋向动词等都归入了指示词系统(参见 Kaplan 1989; Fillmore 1997: 61, 77)。不过本书所说的指示词是狭义上的,它对应于英语中的 demonstratives,侧重于它的指向功能(pointing function),该功能往往伴随有说话人指称某一客体或地点的手势,或者是某个模仿性的行为。本书对指示词的界定依据两个语义特征参数:一是要以说话人为参照点,二是要有距离区别意义。典型的指示词以指示为其基本功能,能够体现距离意义(在空间、时间或心理上离说话人远还是近)。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汉语中某些处所词(“这里/这儿”“那里/那儿”)、某些时间词(“这时”“那时”)、某些性状方式词(“这样/这么”“那样/那么”)、某些趋向动词(“来”“去”)等应属于指示词;而人称代词(“我”“你”“他/她”及其复数形式)、方位词(如“前”“后”“左”“右”“东”“西”“南”“北”)、亲属称谓词(如“妈妈”“弟弟”“姐姐”)等的功能虽也类似,但它们要么没有跟说话人构成参照关系,要么不表示距离意义,所以还是与一般所谓的指示词有一定区别,应该将这些词排除在外。

1.1.2 指示词的分类

1.1.2.1 语义分类

由于汉语的指示词在不同的句法位置出现时没有形态上的区分,汉语的指示词系统本质上是由于具有相同的语义特征而形成的聚合体,因而从语义上进行分类就显然尤为必要。根据指示词所指称的对象进行分类,是目前汉语学界所普遍认可的分类方法(例如,可参见朱德熙,1982: 85)。具体来说,指示词可分为指称个体、指称处所、指称时间、指称性状、指称方式、指称程度等六类。以上古汉语为例,虽然该时期的指示词系统非常繁复,但在我们看来,有些词不宜归入指示词,真正的指示词也就十几个。指称个体、处所和时间的指示词,表近指的有“此、斯”,表远指的有“彼

(匪)、夫、伊”；①无所谓远近的指示词有“兹、是(时/寔/氏)、厥、其、之”；②指称性状、方式、程度的指示词有“尔、若、然”。③至于其他的指示词，如表旁指的“他(它、佗)、余、异、傍”，表不定指的“莫、靡、无(毋)、罔(兼有否定性)、或”，表分指(或称“逐指”)的“每、各”，表虚指的“某、甲、乙”，表特殊指的“焉”，表辅助指的“者、所、攸”等等，并不在上述体系之内，需要另外讨论。

从句法功能和语法性质上看，指称个体、处所、时间的指示词和指称性状、方式、程度的指示词明显不同。前者一般作定语、主语、宾语，是体词性的；后者除了作定语、主语、宾语外，还经常作谓语、状语和补语，是谓词性的。在上古汉语中，虽然体词性指示词偶尔有谓词性用法，但总体上不影响这两类指示词的划分。有的学者提出分按体词性、谓词性给上古汉语的指示词分类行不通，理由是上古汉语中绝大多数指示词都是体词性和谓词性兼备的(参见洪波，1991)。不过据笔者考察，除了“尔、若”是体词性和谓词性兼备以外，其他大部分指示词并非如此。支持将指称个体、处所、时间的指示词归入体词性指示词和将指称性状、方式、程度的指示词归入谓词性指示词有类型学上的证据，据刘丹青(2017: 402)对跨语言或跨方言指示词的考察，指称不同对象的指示词在距离范

① 有的学者，如黄盛璋(1983)、向熹(2010: 93)把“伊”归入近指词。

② 古汉语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兹”表近指，郭锡良(1989)认为“兹”既非远指，也非近指，而是一种广泛的指代，即泛指。我们同意郭先生关于“兹”既非远指也非近指的观点，但不同意表泛指的说法，具体理由详见3.4.2节的讨论。关于“是”的语义属性，不少学者认为它是表近指或中指的，详见第五章的讨论。关于“厥”的语义属性，不少学者把它解释为“那”(参见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古代汉语虚词词典》第32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或者表远称、远指(参见杨树达，1984[1930]: 69; 黄盛璋，1983; 史存直，2005: 158; 张玉金，2006: 299等)。我们认为“厥”“其”关系密切，均表认同指，具体理由详见第四章的讨论。此外，“旃”和“诸”在上古汉语中有时也有相当于“之”的用法(参见杨伯峻、何乐士，2001: 155)。转引两例如下：陟彼嵎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诗经·魏风·陟嵎》)| 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孟子·公孙丑下》)

③ 关于指称性状、方式、程度的指示词，周法高(1959: 155)还提到了“乃(迺)”字。不过据周先生的意见，该字可能是“如斯”的合音(“乃”“斯”上古同为之部字)，则“乃(迺)”是个特殊的复合指示词，与“尔、若、然”等单纯指示词不同。

畴内的语义区分度上存在着如下一个等级序列:

(1) a. 方所 > 个体 > 时间 > 性状方式

b. 性状方式 $\supset$ 时间 $\supset$ 个体 $\supset$ 方所

上面的 a 式表示方所指示词分得最细,其次是个体指示词,依次类推。b 式是 a 式等级序列的蕴含式表达法,即假如一种语言或方言中左边的指示词有这样的区分度(如近远二分),那么其右的必然也有这样的区分度(也是近远二分),甚至分得更细(如近中远三分)。上古汉语(乃至整个汉语史)的指示词也是符合这一等级序列的。鉴于指示词在指称性状方式时处于上面 a、b 两式的最右端或最左端,这说明指称性状方式的指示词具有自己的语义特征,这类指示词和指称方所、个体、时间的指示词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这是我们将上古汉语的指示词分为体词性和谓词性两大类的重要依据。

把上古汉语的指示词分为体词性指示词和谓词性指示词,还有一个类型学的依据。据 Dixon(2003)的研究,人类语言有三类指示词已经得到证明,具体如下:

a. 名词性指示词: 可以和一个包含名词或代词的 NP 共现(如: [this stone] is hot),或者构成一个完全性的 NP(这一点在绝大多数语言中都存在)(如: [this] is hot)。

b. 处所副词性指示词: 要么单独使用(如: put it here),要么和一个带有处所标记的名词共现(如: put it (on the table) there)。

c. 动词性指示词(do it like this),往往伴随着一个模仿性行为: 这类指示词可以单独作谓词,也可以和其他动词连用。

Dixon 指出,类型 a 和 b 在任何一种人类语言中都存在(只有南非克瓦桑语族(khoisan)的 Ju|'hoan 语是个例外),类型 c 相对来说偏少。在上古汉语中,指示词表处所一般采用“於(于)、在、处+指示词”的形式,“爰”“焉”相当于“於(于)+是”,有时也可以表处所。^① Dixon 在谈到处所副词性指示词时还指出,有些语言的副词性指示词还有一

① 古汉语相关例证可参见周法高(1959: 160-165)。

个次类,可以表达方式,具有“如此、以这种方式”这样的意义。如泰卢固语(Telugu,属于印度南部的德拉威[Dravidian]语族)就是如此,不过泰卢固语的副词性指示词是通过在名词性指示词作为词根的基础上添加后缀构成的,这与上古汉语表示方式的“尔、若、然”与名词性指示词不同源不是一回事。

1.1.2.2 语篇功能分类

Himmelman(1996)认为,指示词有四种篇章功能,即“情景用”(situational use)、“话语直指用”(discourse deictic use)、“示踪用”(tracking use)和“认同用”(recognitional use)。“情景用”大体上相当于 Halliday and Hasan(1976: 33)所说的“外指”(exophora)或者普通语言学文献所说的“直指”(deixis),国内有的学者或称作“当前指”(参见吕叔湘,1985: 203),指的是对处在说话人和听话人周围具体的、直接面对的人、事物、处所等进行指称,即交际情景指示。“话语直指用”指的是对(与指示词)相邻接的话语片断所表达的命题或事件的指称。Lyons(1977: 667)称作“篇章直指”(textual deixis),Levinson(1983: 83)称作“话语直指”(discourse deixis)。国内的学者,如方梅(2002)称作“篇章用”(textual use)。话语直指不同于对处于言谈现场中某一(些)客体的直指,它是对语篇的指示。“示踪用”属于回指(anaphora),它和话语直指用的区别是,“话语直指用”指称的是上下文所述的命题或事件,而“示踪用”回指的是前文所提及的某一客体。从语篇衔接的角度看,不管是指称上下文所述的命题或事件,还是回指前文所提及的客体,都是指称语篇所述内容,即都属于 Halliday and Hasan(1976: 33)所说的“内指”(endophora)。就汉语来说,有的指示词既有话语直指用法,又有示踪用法(如古汉语的“之”)。^①“认同用”指的是指示词所指称的

^① Dixon(2003)认为,把对话语或篇章的指示称作“直指”容易造成混乱(笔者按,如此就无法与对处于言谈现场中某一[些]客体的直指相区分了),明智的做法是最好不要使用这一术语,因此他把话语直指用和示踪用分别改称为“篇章回指/预指”(textual anaphora/cataphora)和“替代回指/预指”(substitution anaphora/cataphora)。不过他坚持认为把这两种指示加以区分还是有必要的。

对象是通过听说双方特定的、共享的知识来识别,而不是通过情景线索或者通过指称正在进行中的前面的话语片断来识别。与前面三种语篇功能相比,“认同用”强调只要是听说双方所共知的客体、听说双方所共同经历的客体,这时都可以通过添加指示词来增强其有定性。方梅(2002)指出,认同用通常用于引入一个可辨识性相对较弱的谈论对象。

与上述分类类似,有的学者从指示词的语篇功能上把指示词分为“直接指示”和“间接指示”两大类,后者又进一步分为“段内指示”和“跨段指示”(参见王道英,2005: 51-52)。所谓直接指示,即上文 Himmelmann(1996)所说的“情景用”,或者 Halliday and Hasan(1976: 33)所说的“外指”(exophora),指的是对言谈现场中的客体(人或事物)、处所、时间、事件等的指向性指示,这一功能往往伴随有说话人表明所指的手势、眼神等。所谓间接指示,即语篇指示,大体上相当于 Halliday and Hasan(1976: 33)所说的“内指”(endophora),指的是对话篇中某个(些)语言项的指称。根据被指称的语言项位于指称词之前还是之后,内指又有“回指(anaphora)”和“预指(cataphora)”之分。^①就汉语来说,指示词的语篇功能以直指和回指为主,预指少见。

我们认为从语篇功能上对指示词加以分类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指示词不光是对言谈现场中的人或事物进行指称,也要对话篇进行指称,这符合语言演化的规律。例如(转引自赵世开主编,1999: 11,26):

- (2) Lend you money? No, I shall do nothing of the kind. (=of that kind)

“借给你钱? 不,我决不干那种事。”

- (3) I am occupied for the moment. (=for this moment)

“这会儿我没空。”

在例(2)中, the kind 回指上文 lend you money, 这是对话篇内容的指称; 在例(3)中, for the moment 是指说话时的那会儿, 即说话时的情

① 在西方语言学文献中,预指或被称作“前指”(forward anaphora)。

景,即外指。英语里也可以不用定冠词 the,而用指示词 that、this。英语学界认为,定冠词 the 是 that 的弱化形式(weakened form)。赵世开(1999: 27)还指出,英语里的 that、this 和汉语的“这、那”都可以用于回指,而英语里的 this 和汉语的“这”可用于预指,但英语里的 that 和汉语的“那”不能用于预指。

指示词在表示回指时,由于所指在上文已经出现,得到了确立,从理论上说,不需要说明所指的远近,后面的指称词语使用远指词、近指词甚至没有远近区分的第三人称代词都是可以的。例如:

- (4) 我昨天在街上看见一个不怕冷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她就只穿了一件毛衣。

但从实际文献来看,汉语选用近指词还是远指词仍有一定的选择性(上古汉语没有专职的第三人称代词),其背后有一定要素起制约作用,比如时间距离、心理距离甚至文化因素等。

上面指出,汉语的指示词大多用于直指或者回指(预指占少数)。大体说来,现代汉语中“这”倾向于用于直指,而“那”更倾向于用于回指(参见 Teng 1981)。例如,当我们谈到当前的某个时间时,经常说“这个月”“这个星期”“这个上午”“这个晚上”“这个周末”等,而一旦说“那个月”“那个星期”“那个上午”“那个晚上”“那个周末”时则往往是回指性的。汉语中之所以经常用“那”而不是用“这”来表示回指,大概是因为在操汉语者的心目中,回指的指称对象往往在说话时间之前就已经被说话人所认识和了解了,因而在时空上容易被理解为是“远离的”,而这正是远指词“那”的属性。

1.2 选题意义

从历时的角度看,汉语的指示词系统从古至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郭锡良(1989)、王灿龙(2006)的研究,汉语指示词的产生,最初只是为了指称一般事物(如“兹”和“之”),后来随着社会发展,事物纷繁,语言的使用日益频仍,词句的组织日益复杂,指示词才有了远近的

区别,与有定指示词相对的无定指示词也陆续出现了。如在甲骨文中,根据郭先生的看法,指示词的系统只有一类,无所谓近指还是远指,西周以后指示词的数量开始大量增加,再加上时间、方言等因素,上古汉语的指示词系统极为繁复。但是汉代以后,随着汉语整个语法体系的发展,指示词系统又走上趋于简化的道路(人称代词、否定词、疑问词等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为了区分在指示处所、时间、性状、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指示性短语开始陆续出现。由此可见,汉语的指示词系统一直在不断的变动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本书立论的客观依据。本书的主要研究目标是,拟通过对汉语指示词系统历时演变过程的研究,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方言的指示词研究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参考,尤其是通过对我们所认定的汉语史上的中性指示词范畴、(准)定冠词范畴、(准)标补词范畴以及再生性指示词来源问题的揭示,为更好地提炼汉语指示词的语言共性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参考。

1.3 本专题研究现状回顾

1.3.1 对上古汉语指示词系统的研究

1.3.1.1 上古汉语指示词的分类

(i) 句法分类。这种分类是从句法功能上,即指示词是独用还是与名词合用而对指示词所进行的下位区分。早期的研究,如马建忠(1983[1898]:43、78)把指示词分为“指名代字”和“指示代字”两类,这大体上相当于杨树达(1984[1930]:59、146)所说的“指示代名词”和“指示形容词”。但这两类实际上很难划清界限,因为许多指示词兼属两种情况,同一个指示词往往既有指示功能又有代替功能,因而这种分类后来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如高名凯(1986[1948]:118)就认为这种区分没有必要,后来也罕见有学者接受这种分类。目前大多数学者一般把表示各种意义,出现在各种句法位置的指示词都统称为指示代词。

(ii) 语义分类。这种分类是根据指示词所指称的对象和说话人之间的距离对指示词所进行的下位区分,即把指示词分为近指和远指两类。这一分类方法滥觞于马建忠(1983[1898]: 82)而实践于杨树达(1984[1930]: 59、146)、吕叔湘(1990[1942]: 163)、王力(1985[1943、1944]: 212)、高名凯(1986[1948]: 119),后经王力(1980[1958]: 277)的推广而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如周法高,1959: 117;潘允中,1982: 91;黄盛璋,1983;蒋礼鸿、任铭善,2016[1984]: 174;杨伯峻、何乐士,2001: 145;向熹,2010: 88;史存直,2005: 156;张玉金,2006: 230;康瑞琮,2008: 133等)。不过冯蒸(1983)对这种传统的二分法提出了质疑,他根据汉藏语系的指示词普遍存在着三分或多分这一现象,认为上古汉语的指示词也应存在三分现象(即在近指和远指中间再加上一套中指)。继冯蒸之后,郭锡良(1989)也对上古汉语的指示词系统重新进行了探索,他认为上古汉语的指示词系统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他首先从语法属性上把指示词分为体词性和谓词性两大类,^①而体词性指示词内部又有泛指和特指的对立,^②还有近指、中指和远指的对立。洪波(1991)进一步提出,上古汉语的指示词既不是二分,也不是三分,而是四分,他分为近指、中指、远指和兼指(即既可以指近,又可以指远)四类。

1.3.1.2 上古汉语指示词的句法功能

上古汉语中的指示词在句法功能上有一定的分工,其中“彼”“此”“是”一般作主语,“之”一般作宾语,“其”一般作定语、兼语(包括小句的主语、分句的主语)等。不过这种分工不是太严格,尤其是“彼”“此”“事”除了经常作主语以外,作宾语的情况似乎也不在少数;“之”和“其”在句法功能上倒是受到较大的限制,如前者从来不作主语,后者从来不作独

① 李佐丰(2003: 246、253,2004: 165、180)也如此分类。

② “特指”的概念,在郭锡良先生之前,王力(1980[1958]: 278)已提出过,他指的是上古汉语的指示词“其”(非近指,亦非远指)。“泛指”的概念,杨伯峻、何乐士(2001: 145)认为指的是有所指代,但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确定的对象,包括上古汉语的“之”以及其作用与之相当的“焉、旃、诸”,向熹(2010: 94)对“泛指”的理解是既可以近指,也可以远指,包括上古汉语的“尔、若、然”。

立句的主语和宾语,但在其他位置上它们有时又可以跟“彼”“此”“是”以及“夫”“厥”等指示词互换(如周法高,1959: 88-142;王力,1980[1958]: 277-281;郭锡良,1989;杨伯峻、何乐士,2001: 145-161等)。

1.3.1.3 上古汉语指示词的时间性

上古汉语中,指示词“时”“是”双声音近,前者出现较早,多见于《尚书》和《诗经》,后来被“是”所取代(参见黄盛璋,1983)。另外一组指示词“厥”和“其”,在商代和西周早期,两者本不属于同一词类,一为副词,一为指示词,但西周中期以后,副词“其”逐渐侵入“厥”的地盘,出现了指示词用例,到了战国秦汉,“其”彻底取代了“厥”(参见唐钰明,1990)。

1.3.1.4 上古汉语指示词的地域性

在上古汉语文献中,“斯”主要见于《论语》《礼记·檀弓》和《孟子》中,其他古书中少见(《诗经》中虽屡见,但很少用作指示词),关于这一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经指出,现代不少学者据此认为“斯”当是春秋鲁方言的指示词(参见向熹,2010: 91;黄盛璋,1983),不过也有学者根据上古汉语其他古书中也偶有“斯”的用例而提出质疑(参见郭锡良,1989)。

1.3.2 对上古汉语指示词历史演变问题的研究

(i) 指示词“是”的历史演变研究。目前,学界对古汉语中的指示词“是”发展出表判断的系词“是”已经基本形成定论,但对其语法化途径尚缺乏有效论证。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在先秦汉语里,指示词“是”经常处在[主语/话题,是+谓语]这样的句法框架中,当前面的主语过于简短时,“是”的回指意味就减弱了,这时主要起联系主语和谓语的作用,“是”逐渐产生出系词的性质来。不过实际文献表明,当前面的主语形式简短时,“是”的回指意味未必就会减弱,而当前面主语的形式较长时,“是”仍有被重新分析为系词的可能,这说明促使“是”由指示词发展为系词应该还有其他更主要的诱因。

(ii) 指示词“夫”的历史演变研究。古今学者们大都注意到指示词“夫”与发语词“夫”关系密切,但两者之间是如何演变的,至今尚未

有人做过深入研究。另外,“发语词”这个称呼显然不太科学,因为这个“夫”字不但可以用在句首,还可以用在句中,这说明它的作用决不仅仅表示要发议论、引出下文。个别学者(如王卫峰,2009)曾把“夫”的这种用法概括为起“统摄功能”,与前人相比,这种意见虽然深入了一步,但仍没有准确说明“夫”的语法功能。

(iii) 指示词“之”的历史演变研究。在上古汉语中,语法词“之”主要有指示词和结构助词两种用法,结构助词实质上是修饰成分和中心语之间的连接标记,从跨语言的角度看,指示词的定语性用法通常是这类连接标记的历史来源。围绕“之”的这种演变已有较多研究,较重要的有王力(1980[1958]:389)、郭锡良(1989)、石毓智、李讷(1998)、余霭芹(2013[1998])、石毓智(2002)、张敏(2003)等,研究结论趋于一致。近些年来,还有学者对指示词“之”的来源尝试做了可贵的探索,如张定(2015)。根据张定先生的研究,上古汉语的“之”既可以用作“往”义动词,也可以用作指示词,两种用法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他通过考察甲骨文的材料,认为“之”字经历了“‘往’义动词>过去的(时间)>远指代词”这一语法化过程。从类型学的角度看,指示词“之”来自位移动词“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张文的不足之处是,其研究结论是建立在甲骨文的指示词“之”是表远指的前提之下的,但“之”是否表远指实际上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详细讨论详见本书第三章),因而张定先生提出的所谓“之”的“过去的(时间)>远指代词”这一演变环节还存有疑问;另外,对于“之”表“过去的(时间)”和表远指代词两种用法之间的判别标准张先生也没有做出明确界定。^①

(iv) 旁指词“他”的历史演变研究。目前学界一致的看法是,上古汉

① 张定先生提到了汉语史上“往”“去”也经历了从位移动词到表“过去的(时间)”义,想以此作为佐证,不过令我们感到疑惑的是,与“之”相比,“往”“去”表“过去的(时间)”的用法更加典型,而且汉语史上用例更多,但“往”“去”却没有进一步演变为指示词。这从侧面说明具有趋向意义的动词向指示词的演变虽然有类型学的依据,但“之”是否也遵循了这一演变还值得商榷,若使该结论成立,还需要更加充足的证据和更加充分的论证。顺便提及的是,过去曾有学者把中古近代汉语中“去”表“过去的(时间)”的用法当作了时间介词,但据我们的研究,这种用法并不典型(参见梁银峰,2008)。